

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

周中明文集 ④

周中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

周中明文集 ④

周中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 / 周中明著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2

(周中明文集)

ISBN 978-7-5596-2324-9

I. ①桐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桐城派—文学研究
IV. ①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4201 号

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

作 者: 周中明

总 发 行: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
封面设计: 张 敏

版式设计: 柳淑燕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34 千字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54 印张

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324-9

定价: 698.00 元 (全四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3638551

上篇 桐城派研究

第一章 绪 论 /2

第二章 桐城派的先驱者——戴名世 /34

第三章 桐城派的创始者——方苞 /77

第四章 桐城派的拓大者——刘大櫟 /127

第五章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——姚鼐 /174

第六章 桐城派的传播者——姚门弟子 /236

第七章 桐城派的旁支——阳湖派 /284

第八章 曾国藩及“桐城——湘乡派”的“中兴” /305

第九章 桐城派的式微——严复、林纾等清末民初的桐城派作家 /337

第十章 桐城派的历史地位及近百年来对它的评论 /356

◆相关链接

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/381

关于刘大櫟哲学思想的思考 /396

方东树论 /410

忧时济世，力倡改革——薛福成评传 /427

薛福成的变法改良思想值得重视 /443

下篇 姚鼐研究

试论姚鼐对统治者的离心倾向和对自我的热烈追求 /458

姚鼐追求自我的思想嬗变过程及其时代特色 /471

姚鼐对君子人格理想的坚守和追求 /486

姚鼐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——姚鼐中年主动辞官的原因辨析 /506

姚鼐与戴震的关系辨析 /526

姚鼐“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”之我见 /552

论姚鼐爱民、济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 /565

论姚鼐对封建官吏形象的描写 /582

姚鼐的妇女观和他笔下的妇女形象 /597

论姚鼐散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——驳“不关心国计民生”说 /611

论姚鼐的求实精神和写实特色 /625

论姚鼐的“以诗为文” /637

论姚鼐的语言艺术 /666

论姚鼐其人其文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/694

姚鼐评传（公元1732—1815） /716

◆附录一 书评和序言选辑

读《红楼梦的语言艺术》 /786

红学蓬勃有生机——喜读周中明的两本红学著作 /789

《红楼梦——迷人的艺术世界》序 /794

小说本体研究的力作——序周中明著《红楼梦的艺术创新》 /801

游艺小品——敬呈周中明先生 /811

中国小说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——周中明《中国的小说艺术》序 /814

《桐城派研究》序 /818

评周中明《桐城派研究》 /820

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——周中明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/825

◆附录二 关于周中明学术论著的评介文章

◆附录三 周中明公开发表的作品

上篇
桐城派研究

第一章 绪论

一、缘起

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，清代的桐城派是持续时间最长、作家人数最多^①、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。

桐城派的得名，是由于它的先驱者戴名世，创始者方苞，拓大者刘大櫟，集大成者姚鼐，传播者方东树、刘开、姚莹、吴汝纶、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等，皆是安徽桐城人。因此，时有“天下高文归一县”“声名冠天下”之誉。直到清末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李鸿章还说：“今天下古文者必宗桐城。”^②

桐城派并非囿于桐城一隅，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、姚鼐皆长期生活在北京、南京，戴名世、刘大櫟在北京时间虽不很长，但其影响也遍及全国。更重要的是，桐城派的散文创作和文论主张，不是偏于“性灵”“格调”“肌理”等某一方面，也不是只学“秦汉”或“唐宋”，而是全面继承，众美兼收，集我国全部古代散文和文论之大成。因此，它在整个清代文学中，占据了非常突出的正宗地位。

① 据刘声木撰《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》，收录的作家达1223人。其中有的是属于桐城派师承的前辈作家，如明代的归有光等，有的则是撰者硬拉进来的，不过绝大多数当属于桐城派无疑。

② 李鸿章：《惜抱轩遗书三种序》。

不过，从戴名世、方苞到刘大櫟，他们皆从未以“桐城派”自居。直到他们的第三代传人姚鼐，于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写的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中，才正式标榜“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”。他写道：

曩者鼐在京师，歛程吏部、歷城周编修语曰：“为文章者，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。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，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。昔有方侍郎，今有刘先生，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乎？”鼐曰：“夫黄、舒之间，天下奇山水也。郁千余年，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。独浮屠之偶雄，自梁、陈以来，不出二三百里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。其徒遍天下，奉之为宗。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？夫释氏衰歇，则儒士兴，今殆其时矣！”既应二君，其后尝为乡人道焉。

——姚鼐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第114页

尽管如此，姚鼐仍未明确言“派”。正式打出“桐城派”旗号的，是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曾国藩。他说：

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，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于刘君大櫟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？”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桐城派，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

——曾国藩：《曾文正公全集》卷8《欧阳生文集序》

此后，仍有不少桐城派作家反对以“派”相称。姚永朴即指出：

惜抱先生《古文辞类纂序》云：“夫文无所谓古今也，惟其当而已。”苟知其是与当，尚何派别之可言？……宗派之说，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，播于流俗之口，而浅学者据以自便，有所作弗协于轨，乃谓吾文派别焉耳。近人论文，或以“桐城”、“阳湖”离为二派，疑误后来，吾为此惧。

——姚永朴：《文学研究法》，第63、64页

“五四”时期竭力捍卫桐城古文，被称为“桐城的嫡派”^①林纾也说：

仆生平未尝言派，而服膺惜抱者，正以取径端而立言正。若弗务正而日以掇撝钉短，震眩流俗之耳目，吾可计日而见其败。

——林纾：《畏庐续集·与姚叔节书》

其实，这种“取径端而立言正”，只能说明桐城派之所以占据清代散文正宗的地位，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和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，但也正因为这种“端”和“正”，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。由于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学皆已走到了它们的尽头，所以“五四”运动要以新民主主义代替封建主义，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。这反映了社会和文学发展历史的必然要求。

跟任何事物一样，桐城派的兴起、旺盛和衰败，都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。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寻求其历史发展的轨迹，总结其经验教训，为我们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。

① 《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》，第109页。

二、桐城：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

（一）风景秀丽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

姚鼐曾把“天下文章，其出于桐城”，归功于桐城具有“天下奇山水也”，“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”^①。桐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又怎么能引发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桐城作家群的兴起呢？这未免令人颇感困惑，甚至有点不可思议。然而经过笔者实地考察和仔细研究，却发现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对桐城派作家确有积极的影响，其主要表现：

1. 山水奇秀，促使师法自然、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。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散文的正宗，跟它克服“以华靡相尚”，“连篇累牍，皆属浮词”的陋习，而把古文引向自然纯朴、清正雅洁的正途，是分不开的。而这跟桐城自然风光的积极影响，又大有关系。例如，戴名世说：“余性好山水，而吾桐山水奇秀，甲于他县。”^②他主张为文“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”^③。这里所说的“自然”，虽然不是指自然景物，但它又显然是受自然景物影响的结果。对此，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：

窃以谓天下之景物，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，惟古之琴师能写其声，而画史能貌其像，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。当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间，辄拟为一境，以追其所见。其或为海波汹涌，风雨骤至，瀑泻岩壑而湍激石也；其或为山重水复，幽境相通，明月青松，清冷欲绝也；其或为远山数点，云气空蒙，春风淡荡，夷然倏然，远出于尘外也；其或为江天万里，目尽飞鸿，不可涯涘也；其或为神龙猛虎，攫

① 姚鼐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114页。

②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283页。

③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105页。

拿飞腾，而不可捕捉也；其或为鸣珂正笏，被服雍容；又或为含睇微笑，绝世而独立也。凡此者，要使行墨之间仿佛得之。故余之文章，意度各殊，波澜不一，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径求也。

——《戴名世集》，第123、124页

桐城派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，不尽属封建之道，同时，它也以自然界为创作的源泉、理论的坐标和形象的参照，如同飞机的发明，既是发明者的创造，更是对飞禽的仿生的结果。

2. 既开放又封闭的区位，有助于桐城作家的成长。恰如刘开所说：“余观枞阳（原属桐城）之地，外江内湖，群山为之左右，峰势喷薄，与波涛互相盘护，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。士生其际，必有不为功利嗜欲所蔽，而以气概风节显于天下。”^①所谓“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”，说得未免有点玄乎。而他所说的“内江外湖，群山为之左右”，既有其开放性，又有其封闭性的区位环境，倒确实是对桐城派作家的成长，有其积极影响的。

正因为“外江内湖”，对依靠水上交通为主的古代，有其开放性的优势，所以才使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等，皆得以经常往来于南京、北京等大会，开阔视野，增长才干，发挥作用，提高声誉，扩大影响。

又因为“群山为之左右”，有其内陆交通不便的封闭性特征，所以对于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来说，是个劣势，而对于抵御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来说，那一座座大山，则犹如一道道屏障，又是其优势所在。因此，戴名世说：“桐城居深山之中，地方百余里，一面滨江，而群山环之，山连亘千余里。……四封之内，田土沃，民殷富，家崇礼让，人习诗书，风俗醇厚，号为礼义之邦。”^②

① 刘开：《刘孟涂集》卷9。

②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310页。

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所造成的此种淳朴的社会风气，对于养成桐城派作家所独有的性格——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、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精神，显然是大有帮助益的。

3. 优美的自然风光，足以吸引外地人才的荟萃。早在北宋元符三年(1100)，被称为我国十大名画家之一的李公麟，即辞官隐居于桐城龙眠山，自号龙眠居士，晚年作《龙眠山庄图》，尽收山中二十景。苏轼曾迁居桐城官庄，并为之作跋，苏辙为之作《龙眠山二十咏为李伯时赋》。黄庭坚亦就读于桐城灵泉寺，并作咏龙眠山诗。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，如戴名世、方苞、姚鼐、方东树等人的远祖，皆属于从婺源、余姚等外地迁来桐城的移民。他们为什么要移居桐城呢？姚鼐作了明确的回答：“悦桐城山水，卜居于东乡之麻溪，遂家焉。”^①刘大櫟于歙县教书，其后以老归里，他的学生吴定也从歙县移居桐城，“间造其庐而请益焉，因得纵观龙眠之山水，叹其雄伟奇丽，遏江淮而东趋，障豫州、荆汉而西却，宜其文章之盛冠绝乎当时”^②。吴定还说：“海峰先生以振古之才厄塞终老，然先生常自放于山川泉石，日与吾徒广稽今古，吟啸自豪，非特先生乐之，虽予与滨麓亦莫不相顾而乐也。”^③作为“姚门四杰”之一的刘开，虽然也终生未仕，穷困潦倒，但是桐城的佳山秀水，却给了他以精神支柱。他曾对姚元之说：“吾乡多佳山水，使吾得有菽水资迎吾母，居龙眠杯渡间，手一编，日夕讽咏，且不去吾母左右，其乐当何如。”^④《刘孟涂后集·诸家评语》则称：“桐城为江山形胜处，宜我孟涂之天姿卓犖也。”

俗话说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对于养育本地人才和吸引外来人才所起的积极作用，岂不令人信然？

① 转引自姚莹：《东溟文集》卷5。

② 吴定：《紫石泉山房文集》卷6。

③ 吴定：《紫石泉山房文集》卷6。

④ 姚元之：《刘孟涂传》，见刘开《刘孟涂集》。

（二）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

“文章甲天下，冠盖满京华。”这对桐城来说，绝非过誉。

据道光七年《桐城续修县志》记载，明清两代桐城有进士265人，举人589人。其进士和举人之多，皆比同属安庆府的怀宁、潜山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等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一倍以上。宋代名画家李公麟，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，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，著名诗人钱澄之，父子两代相继任清代宰相的张英、张廷玉，皆出自桐城。正是这种人文荟萃的桐城社会历史环境，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等人才的辈出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恰如方东树在为刘大櫟族裔作的《刘悌堂诗集序》中所指出的：桐城“人文最盛，故常列为列郡冠。是故自明及我朝之兴，至今日五百年间，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，而未有止极。为之者众，则讲之益精，造之愈深，则传之愈远，于尤之中又等其尤者，于是则有望溪方氏，海峰刘氏，惜抱姚氏三先生出，日久论定，海内翕然宗之”^①。

具体地说，桐城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，对于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，至少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促进作用：

1. 养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。“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。”这就是桐城世代相传，被桐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。

尊师重教的民谣，在桐城更是家喻户晓，盛传不衰。《没有先生名不成》《劝学》等民歌，皆反映了桐城民间对教育的普遍重视。

正因为有这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，所以才会于一县之内造就“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”。潘江于康熙年间，即将明代至清初桐城古文家的杰作，辑成《龙眠古文》24卷，并编有《桐城乡贤实录》1卷。由于“为之者众”，才会“讲之益精，造之愈深”，才会有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等出类拔萃的大作

^① 方东树：《仪卫轩文集》卷5。

家涌现。

2. 形成了同辈切磋的群体效应。俗话说：“一人不敌二人智。”由于在桐城“成学治古文者综千百计”，这就有利于形成同辈之间互相切磋、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。如戴名世说：“余年十七八时，即好交游，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，置酒高会，相与砥砺以名行，商榷文章之事。”^①而方苞之所以能成为桐城派的创始者，又跟他在古文写作上经常与戴名世切磋，得到过他的帮助，大有关系。戴名世在为方苞作的《方灵皋稿序》中即指出：“盖灵皋自与余往复讨论，面相质正者且十年。每一篇成，辄举以示余，余为之点定评论，其稍有不惬于余心，灵皋即自毁其稿。而灵皋尤爱慕余文，时时循环讽诵，尝举余之所谓妙远不测者，仿佛想像其意境，而灵皋之孤行侧出者，固自成其为灵皋一家之文也。”^②他们就是这样在“互相师资”（戴名世语）中，既互相取长补短，共同得到提高，又在互相比较之中创造个人的风格特色，自成其为“一家之文”。桐城派大作家的人才辈出，如果没有这种相互切磋的群体效应，那就如同没有大量的工蜂和雄蜂，而要造就独领风骚的蜂王一样，是难以想象的。

3. 形成名师出高徒、代代相传的连锁效应。例如，刘大櫟既未考取科举功名，更未做过大官，一辈子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，即使有再大的文学才能，在那个讲究科举功名和官本位的时代，也很可能被埋没掉，但是他却取得了在古文创作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。其至关重要的原因，即在于他得到了康熙末已经“名重于京师”的方苞的栽培、赏识和提携。当刘大櫟于29岁入京应试，拜同乡方苞为师后，方苞逢人便说：“如苞何足言邪！吾同里刘大櫟乃今世韩、欧才也！”姚鼐说：“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。”^③

而姚鼐的成才和出名，则又得力于刘大櫟的教导和提携。刘与姚的伯父是

①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73页。

②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54页。

③ 见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308页。

世交，过从甚密，以至刘的举止、声音、笑貌，都给少年姚鼐以极深的影响。用姚鼐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幼年即“尝侍先生（指刘大櫟），奇其状貌言笑，辄仿效以为戏。及长，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，学文于先生。游宦三十年而归，伯父前卒，不得复见。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，而独得数见先生于枞阳。先生亦喜其来，足疾未平，扶曳出与论文，每穷半夜”^①。刘大櫟对姚鼐的赞赏、鼓励和器重，可谓不遗余力。如刘说：“我昔在故乡，初与君相识。君时甫冠带，已具垂天翼。”“后来居上待子耳！”^②又说：“读其所为诗、赋、古文，殆欲压余辈而上之，姬传之显名当世，固可前知。”^③诸如此类谆谆教诲、殷切期望和诚挚赞誉，对于姚鼐的成才和成名，其助益无疑是不可忽视的。

上述事实说明，桐城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，同辈切磋的群体效应，名师出高徒的连锁效应，是造就桐城派人才辈出的三个重要原因，也是三条可贵的历史经验。

（三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

俗话说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，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。从桐城派大作家成才的经历来看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三个共同的特点：

1. 书香之家，严于教育。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，父母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，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厉。例如，方苞说，其父“课余及弟诵读甚严”^④。“吾兄弟三人，少忍饥寒，勤学问，皆咯血。”^⑤“五岁吾父课章句，稍长治经书、古文，吾父口授指画焉。”^⑥“未成童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

① 见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115页。

② 《刘大櫟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，第144页。

③ 《刘大櫟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，第137页。

④ 《方苞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，第416页。

⑤ 《方苞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，第93页。

⑥ 《方苞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，第491页。

《左传》皆已背诵。”^①

刘大櫟的祖、父及长兄均以教书为业。他幼年即从父兄读诗书。他的祖父死后，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，“目虽无见，而操作不辍。櫟七岁，与伯兄、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。每隆冬，阴风积雪，或夜分始归。僮奴皆睡去，独大家煨炉火以待。闻叩门，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，且执手问曰：‘若书熟否？先生曾扑责否？’即应以‘书熟，未曾扑责’。乃喜”^②。

姚鼐的伯父姚范，是当时的著名学者，任翰林院编修，“承累世贤哲之遗风，敦行勤学”^③。姚鼐兄弟三人，从小即受其伯父的言传身教。“尝以一凳环坐三人而读书，其时家贫甚，中夜余叹以为聚读之乐不可得而长也。”^④到22岁，他已能胜任教师之职，“授徒四方以为养”^⑤。因此，刘大櫟说：“姚君姬传甫弱冠，而学已无所不窥，余甚畏之。”^⑥

姚莹是姚鼐的侄孙，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，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。用他本人的话来说：“莹兄弟方幼，太宜人竭蹶延师教之，每当讲授，太宜人屏后窃听，有所开悟则喜，苟不慧或惰，则俟师去而答之。夜必篝灯，自课莹兄弟，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经，皆太宜人口授。旦夕动作，必称说古今贤哲事。”^⑦

2. 艰苦奋斗，世代相传。他们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。由于戴、方、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，而移民必须历经艰苦奋斗，才能在当地站稳脚跟。例如，戴名世说，“得闻先世遗训”，听长辈“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。余虽幼，备志之于心”^⑧。姚莹也指出，那些“贵为王侯彪炳之势，

① 程崧：《仪礼析疑序》对方苞的描述。

② 《刘大櫟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，第161页。

③ 姚鼐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328页。

④ 姚鼐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182页。

⑤ 姚鼐：《惜抱轩诗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，第182页。

⑥ 《刘大櫟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，第137页。

⑦ 姚莹：《东溟文集》卷6。

⑧ 《戴名世集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，第146、147页。